

.....
摇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投资格局 钟金铭 杜文中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5.12

摇ISBN 978-7-5501-2111-1

摇I 摇全摇II 摇①钟摇②杜摇III 摇金融 原中介组织

原研究摇IV 摇F830.62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216360 号

.....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投资格局

钟金铭摇杜文中摇著

责任印制 杨斌

责任编辑 崔静摇叶茜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摇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缘号)

网摇地址 摇 漂浪: 摇曾摇曾摇曾摇曾摇曾摇曾摇

电子邮件 摇 曾摇曾摇曾摇曾摇曾摇曾摇

邮政编码 摇 远摇源

电摇摇话 摇 园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

印摇摇刷 摇 安徽省蚌埠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摇 员园员园伊员园员园伊员园员园

印摇摇张 摇 园员摇

字摇摇数 摇 猿园园千字

版摇摇次 摇 园园园年 愿月 第 员版

印摇摇次 摇 园园园年 愿月 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 摇 员原员园册

书摇摇号 摇 陈丹 苑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愿

定摇摇价 摇 猿猿园元

员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园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目摇摇录

摇员

摇导论	(员)
摇员摇全球互联时代	(员)
摇员摇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人	(员)
摇员摇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群体	(苑)
摇员摇全球互联时代的民族国家	(苑)
摇员摇全球互联时代的区域经济组织	(苑)
摇员摇全球互联时代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苑)
摇员摇全球资本流动与金融动荡	(苑)
员摇国际资本投入和流动方向是经常反复的	(苑)
员摇市场制度和管理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	(苑)
员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利益与风险不对称	(苑)
员摇现代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地区与全球金融动荡	(苑)
员摇对在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进行利弊分析	(猿)
员摇新兴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源)
摇员摇全球化过程的国家竞争态势与投资格局	(源)

摇圆

摇全球化的金融市场	(源)
摇圆摇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金融市场	(源)
圆摇金融资产——一种体现为远期现金债权的无形资产	(源)
圆摇金融市场——资金融通的场所和信用关系的总和	(源)

源

- 源 全球投资的微观主体与投资格局 (猿)
- 源 全球投资的微观主体划分及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 (猿)
- 源 全球微观投资主体划分 跨国工商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
..... (猿)
- 源 可供微观投资主体选择的直接投资方式 (猿)
- 源 一国的金融市场开放与全球金融投资 (猿)
- 源 开放的金融市场的功能 (猿)
- 源 从金融产品角度分类的国际金融投资 (猿)
- 源 全球性金融投资的经济理论支持 (猿)
- 源 企业型跨国直接投资 (猿)
- 源 基于企业角度的直接投资理论 (猿)
- 源 全球化竞争格局中的跨国公司策略 (猿)
- 源 以内部化投资实现跨越国家界限的一体化生产 (猿)
- 源 同一产业内的双向直接投资 (猿)
- 源 应对国际竞争的企业策略联盟 (猿)
- 源 对跨国投资得以形成集聚化格局的解释 (猿)
- 源 格局 怨 形成由国家集团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的投资集聚化
..... (猿)
- 源 格局 员 形成由企业内部化和企业策略联盟造成的投资集聚化
..... (猿)

缘

- 缘 金融全球化中的国家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猿)
- 缘 国际融资造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猿)
- 缘 第一阶段——员 源 年的美国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猿)
- 缘 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远翔看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耘云粤)	(猿原)
远翔看摇各类非洲贸易协定	(猿缘)
远翔看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晕粤云粤)	(猿缘)
远翔看摇美洲国家组织(韵粤杂)	(猿四)
远翔看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粤杂兑)	(猿四)
远翔看摇南方共同市场(酝粤粤粤)	(猿四)
远翔看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韵杂悦)	(猿愿)

摇参考文献	(猿四)
-------	-------	------

员

导摇论

员摇全球互联时代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圆园园年 源月 猿日的《千年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正经历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化’。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从前不曾有的互联世界——群体和个体跨越国家的相互交往越来越直接，通常一点也没有涉及到国家关系。当然，这也隐含着危险。犯罪、毒品、恐怖主义、疾病、武器——所有这些都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在世界传播着，数量也越来越多。即使在遥远地方发生了某一事件，人们也会感觉到威胁。但是全球化的好处也很明显：更快的经济增长、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新的机会。全球化不仅仅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而且有助于国家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采取一致的行动。”

员摇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人

的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互联时代，一个群体和个体跨越国家交往越来越直接的时代，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传统束缚的时代。“民族主义”的共同的显著特征“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愿望以及他的社会文化传统的热爱”例如穆斯林“国家”对传统习俗的执著和信徒们对《古兰经》的虔诚。所以，当今的“民族主义”又被称为我们时代的“世俗的宗教”，所不同的是，在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意识形态之类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的。例如，在许多新建立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国家，拥有它们的殖民地历史所造成的“偶然边界”，使得在这些国家里，通常有好多

个部落和语言。这种情况易导致内战,例如发生在卢旺达、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其国内杀戮之残酷,令人咋舌,动辄以百万人计,但是战争也无法阻止这些国家迅速发展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民族主义是一种可以影响甚至阻止与外国人理性交易的情绪。例如,在秘鲁军政府执政时期,就曾将社会的弊病一股脑归罪于外国公司。^①

但是,今日的世界,毕竟体现了“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大规模国际人口迁移甚至早已经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和发展趋势。而近年来,国际间的人口迁移既是全球化的要素,也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为了更快地理解上述命题,我们不妨从“人力资本”的国际转移的角度审视一下当今所谓的“跨国”子群体队伍正在逐渐壮大的现象。“跨国”的社会场景(杂糅造云)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线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对于“跨国”而言,地域已不像传统移民那么重要和不可或缺,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主权的象征。对这一群体来说,经济、社会、文化的机会与空间具有更重要的含义;有别于传统的移民通常是一元或二元的活动模式,游走于粤(祖籍国)→月(移居国)之间,他们的活动具有多维空间与多元性,其移居模式可以是粤→月→悦→阅→粤这样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跨国”既是其母国(或初始国)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载体,也是第三文化或全球性企业文化的建构者。他们既深知母国文化的精髓,也熟悉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旨趣,作为跨越地理与文化疆界的群体,常常显得更具创造性。他们适应环境,谋求发展的示范作用也激励着整个移民群体,大部分成员认识到自己是国际人力资源中的“流动部分”。该现象最具启发意义的作用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源是一切经济行为、一切经济资源的上游。有研究认为,人才流动率同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而经济的发达程度又同经济的开放程度正相关。越是开放国家和地区,经济就越发达,经济越发达,人才流动的速率就越快。例如,近年来在西方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的长期处于固定单位即不同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的所属人才也同样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发展了,国家间、地区间、企业间的人员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些人,也可以被解释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这里称之为“跨国”)。

^① [美]唐纳德·粤鲍尔等:《国际商务——全球竞争的挑战》,刘东明等译,源藏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圆园园年。

当我们能够以开放的、达观的心态从全球竞争背景去观察这些“自由人”时,不难发现,多样化的未来世界更像奥林匹克运动,但全球化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竞赛)却不存在非凡的领队,也无须有一个上帝般的裁判,竞争结果也不存在宿命式的轮回。虽说在人类社会发史上,政治、经济、科技的“中心”确曾存在和发生过看似有规律性的转移,但那绝不是由非凡的领队与上帝般的裁判命定的。实际上,人类社会曾经的竞争尤其是未来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犹如万花筒的转动,拆穿了,所有光怪陆离的“图像”皆源于能透射或反射七色光的“玻璃片”。“图像”的历史定格取决于这些“玻璃片”的分布、构成和随机组合。在种种组合中,“玻璃片”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有能力主动参与竞争(竞赛)组合的“玻璃片”,那就是“自由人”。

在全球化竞争中,以任何范围界限划定的参赛组队(包括国家界限、区域一体化界限)捧到的团体冠军杯,实质上都来自单项成绩的“积分”,说到底要“微分”到参赛队中“单个人”的能力上。而“单个人”的能力结合恰似万花筒中“玻璃片”的结合。在全球化的统一世界市场上,全球化越是得到深化,“自由人”就越有机会确定自己代表什么“组队”参加竞争(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高度发达并非美国“一国”的发达或一个“民族”的发达,它是“自由人”组队的发达。因此,它体现人类的发达、世界的发达,例如美国甚或欧洲对火星等外空间的探测,其科技水平代表人类能力和世界福祉。

当然,“自由人”的产生也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这首先与“人”作为“人”的能力相关。例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在早期阶段之所以能够具有“丰富性”,基本原因是人的活动还没有发生分割。单个人处在共同体中,与其他人共同从事某一种或几种活动的各个方面,如此产生了主体发展与多方面活动相适应的多方面的才能。也就是说,劳动活动的浑然一体产生了人的能力的“全面性”,而这种“全面性”只是一种“原始的丰富”。也就是说,那时人的能力发展是局限于狭小范围内的,是不自由、不充分、缺乏深刻内容的。总之,人的能力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但那恰恰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缘故。在这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像为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另外,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行为也应该被正确理解为早期社会人的能力、社会关系如个性发展的实现方式和性质。具体来说,在人的发展的早期,由于劳动手段的落后,个人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这使得个人成了实现共同体要求的工具,而这一点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牺牲。原始的生存斗争以最有力的方式形成个人的一切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集体的准则,任何有利于个人或个人的思想都是

受到排斥的,甚至两性关系的安排也必须维护“公社”的权益。个人通过完全依照共同利益来活动,或个人只有把他的本质力量、他的人格、他的理想和他的个性等等全部转让给集体,他才能从中发展起自己的某些技能、社会联系和“个性”。对此,恩格斯认为:“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了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另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由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处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①

后来,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的能力发展的“深刻的片面”。一种被称为“人手”的工人的某种畸形能力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熟练程度,但它在社会的群体劳动面前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说,人的能力的畸形化发展是“社会分工”的一个苦果。即使如此,马克思仍然认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鄙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浪漫是可笑的。发展是硬道理,这种发展包括从原始的丰富到畸形的深刻片面。

追溯历史源头,我们不难发现:一般地,越是往前,个人越是表现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例如在氏族制度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夫与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又整个包括在部落内。“国家”在其公法上也不承认个体家庭。个人从属于较大的整体,这是原始的、荒蛮的社会的特色之一。

资本主义也带来了“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个人独立。社会功能的划分及各种不同功能附着于不同类别的人,意味着人体可以同时属于若干不同的群体,这就给了人以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人身独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有了迁移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利,有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人身也不再依附于他人,但是这种独立,确切地说是人在彼此关系冷漠意义上的互不关心,也是一种幻想和表面的独立形式。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这种独立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社会基础的。人的本质力量不能在外部对象中得到表现、发挥和实现,人仅成为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仅仅为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肉体生存而劳动,自我创造的个性在其中消失了,这是物的依赖关系对个人发展的消极一面。当然,也存在着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中的积极一面,那就是它为社会形成了较全面和丰富的社会关系、需求和能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物的依赖关系有三种基本形式:交换者的相互关系对货币或交换的依赖、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第一种形式的特性,是抽象关系的普遍化。在交换中,从抽象的交换手段的视角看,交换者双方的相互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即是说他们交换的商品是等值的,这一等值是从这些商品对消费者来说所具有的特殊的具体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于是,这些“自由”人格之间的关系全都变为一种普遍的媒介,即变成了价值在货币的符号形式上的化身。因此,在交换之外还保持着个体差别的个人,他们的不同需要和不同产品构成交换基础本身,但这些个人彼此间只存在于他们在市场上彼此产生的价值客体化形式——抽象的量——的关系中。随着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对物的依赖发展为劳动对资本(或个人对生产资料)的依赖。这是第二种形式。人要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交换,起初,工人是为了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随后,在生产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占有了劳动。这是创造价值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是劳动生产力变成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或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的过程。物的依赖关系的第三种形式,是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资本主义发展了人类能力的普遍性和社会性,但它仅仅是以物的形式发展,这种发展可从资本追求增加剩余价值的事实中得到理解。剩余价值的增加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增加工作日)来实现;二是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如通过提高和发展生产力或依靠大规模应用机器)来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创造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的趋势,导致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扩大的趋势,从而创造了一个世界市场的趋势,因而使人们逐渐摆脱其地域界限和民族局限。

相应地,马克思从个人能力发展的方式和性质入手,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发展的特征,并将其概括为“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作为一种明确原则,形成于那个开始大量地造成“孤立的个人”的18世纪,其产生的根据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竞争关系和旧式分工。

从个人能力发展的总特征入手展望个人未来发展趋势,马克思曾指出,“这是个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与工场手工业相应的是个人能力的畸形发展,但机器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承认劳动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未来社会的个人能力发展的本质特征,是每个个人能力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它包括如下三个要素: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个人的类特征的应有发展。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便是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吸收了以往关于人的发展的积极成果,摒弃了其消极成分,并对个人的各方面(类特征、社会关系和个性)的发展做了本质概括,从而给出了一幅个人未来发展的蓝图。

从个人能力发展的社会基础出发展望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性的未来发展,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个人关系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认为在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未来的社会中,这种发展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经济前提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这三个方面。这里的“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即个性的自由发展,其最高成果是自由个性的形成。自由个性,在马克思那里,是描述人或个人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由个性,是指个人能作为个人且能根据其意愿充分自由地表现和发挥其创造能力,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它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与他律性相对应的自律性,即能自己制约、支配自己;与强制性相对应的自由性;与盲目自发性相对应的自觉性,即能意识自身和外部活动条件;与依附属性相对应的独立自主性,即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存条件和活动;与重复性相对应的独创性。

马克思从个人能力发展方式和性质着眼,展望个人未来发展的目标,并将其归结为“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这实际上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式或本质特征。我们看到,这种方式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牺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的双面扬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发展不需要泯灭自己的个性,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潜能、本质力量和创造性为目标,从而建立自己全面丰富的对象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同时,人的发展也不再像“利己主义”那样不顾一切,唯我独尊,而是自觉地将他的能力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固定在符合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这一高尚指向上。把这种方式作为普遍现实确定下来的未来社会,马克思称之为理想“共产主义”。

相联系的母国中心、东道国中心和全球中心之外再增加一个所谓的“区域中心”^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以全球为市场的企业,应当被称为“全球企业”(即“全球公司”)、“全球公司”(即“世界公司”)或“世界公司”(即“全球公司”),并且应当被理解为“无国家公司”(即“全球公司”)。

这些无国家公司,作为互联时代的“自由群体”时,表现为具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调配资金的能力,它可以利用内部资金调拨及划拨价格,把税负减至最低限度,把利润提高到最大限度。它们有能力通过子公司间周密的通讯网络,随时掌握有关国家税法税率的动态,分析研究如何采取相应对策。常用的办法是产品从高税率国子公司输往低税率国子公司时,尽量压低调拨价格;反之,则抬高划拨价格。这样,就可以把一部分利润从实行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转到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从而减轻了税负。通过转移价格,它们还可以回避东道国对其子公司汇出利润及撤回资金的种种限制。

它们还可以利用分公司、子公司之间资金流动的方便,在利率低的地方筹集资金,在利率高的地方贷放资金。由于公司经营规模巨大,贷款利息的微小差别,或各国汇价的轻微涨落,都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或损失。所以,资本在国际间的调度将对公司盈利产生重大影响。它们可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自有资金的融通,并在实行税收优惠的国家或地区设立专门的金融和控股公司,这既可提高自有资金的利用率,也可充分利用当地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以最有利的路径和最快的速度进行资金周转,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些自由群体还在“参与制”的基础上,利用金融资本的控制,把各独立国家辽阔的领土联结起来,以少量自有资本(直接投资)控制巨额的他方资本。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过在美国以外的 100 多家子公司,控制着分布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家子公司,从而稳固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它们除了通过“参与制”进行控制外,还通过国际分包合同网络,扩大其影响及控制范围。生产电子设备的最大垄断组织——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就是通过各级分包关系,控制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万多家企业。

这些自由群体通过在全球不断建立和扩大分支机构及拥有控股权的子公司,把它们的势力伸向了全球每一个角落,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由垄断

^① 1965年,美国学者撰文提出“区域取向”(即“区域中心”),理由是经济区域化、贸易集团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很多企业都以“区域”为中心开展经营,跨国公司为了巩固自己在“区域”内的阵地,往往在母国总部外,又到北美、欧共体、东南亚等地设立地区总部,以便就地加强领导,故“区域取向”也是跨国公司的一项行为特征。

资本支配和管理的、其经营活动从属于跨国公司企业政策的经营“帝国”，被称为“看不见的帝国”。

当初，这些自由群体主要发端于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垄断公司，但作为真正的全球性企业则“没有国籍”^①或“模糊国籍”^②，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庞大的生产能力，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有融合的文化优势、先进的技术装备、优秀的管理技术战略。正是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各方面的优势，在世界市场的角逐中处于优势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这些自由群体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灵活方式参与，除了以拥有多数股权的方式进行控制外，为了迎合这些国家“民族要独立”的需要，在那里常以参股方式建立合营公司，利用其技术与管理大权进行控制。此外，它们还与东道国通过签订合同协议等方式，如技术援助合同、销售合同等等，推行非股权参与以扩大势力。它们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公开挂牌出售的股票，任何国籍的人都可以购买。

这些自由群体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它们足以控制分散在若干个国家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分公司、子公司的经营活动，并能因地制宜地处理有关法律和金融等方面的复杂事务。它们在沟通世界货物、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专门人才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方面得心应手，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能够在广阔的地域内有效地实现各生产要素的远距离结合。

这些自由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专业化协作和大批量生产，相对扩大了机

① 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包含海外的分公司、子公司、联系企业等，除了分公司外，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法人，各有不同的国籍。因此在法律上，能否将跨国公司当作一个单一的实体（奈尔森和里德）一直是大有争议的问题。由于跨国公司至今在法律上还没有正式存在（昂格尔和普里查德），因而也没有什么国籍可言。为了协调各国在公司国籍问题上的利益冲突，20世纪下半叶先后产生了以下两个国际公约，1958年的《承认外国公司、社团和财团法律人格的公约》（裁桑卜尼翁国际法委员会，允诺承认外国公司法律地位）和1976年的《关于相互承认公司和法人团体的公约》（裁桑卜尼翁国际法委员会，云建规则），但这两个公约都避免正面触及有关跨国公司国籍的难题，只是要求缔约国相互承认其公司的法人地位，而且获得议会通过的草签国家为数太少，故始终未能生效。因此，有不少论著，干脆称跨国公司为“无国家公司”（奈尔森和里德）。

② 由于国际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发展，跨国公司所属各企业之间所有权关系的交叉性和多层次性加深，从而使“究竟谁是母公司”这一问题变得愈来愈难以弄清。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项抽样调查（孕杂硬）结果发现：平均每家跨国公司拥有4.9级联系企业（粤），这包括控制股权的子公司，也包括少数股权或以非股权安排方式联系的企业，其中约有1.5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有1.5级联系企业。这次抽样调查结果不仅反映出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多层次等级”（配）的特点，而且也揭示了跨国公司内部所有权关系的纵横交叉的特点。由于母公司地位淡化和职能分散，以致母公司的国籍变得更加模糊。

主权的至高无上原则、主权的不可分性、主权的不受约束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①

按解剖学的分析方法,所有民族国家的主权代表者或直接行使者,大都是现行体制下的受益者,而其受益源泉或权力基础来自国家内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主权乃主权代表者的权力、利益和责任的集合。这一事实便决定了下面一种因果关系:对主权代表者来说,维护国家主权就等于维护自身的权力及随之而来的利益,彻底放弃国家主权就等于自我全盘否定。对此命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为:主权代表者对主权的让渡是有限度的,即主权代表者只有在使与民族国家命运唇亡齿寒的自身利益有所增进时,才会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准确说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代表者或直接行使者的利益,构成了国家主权的硬核。因此,国家主权的弹性又是相对于各国“权利行使者”的利益刚性而言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主权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原因在于国家间的交往纯属必然。同时,共同规则在国家交往过程中又是必不可少的,接受或遵守共同规则就意味着自身选择要受到规则的掣肘,意味着对选择自由的限制。考虑到自给自足不可能实现或实现代价太大,放弃或让渡一部分绝对意义上的主权(完全的独立)通常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是参加全球合作、实现比较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一般而言,国家的决策者总是在主权让渡和使比较利益最大化之间徘徊,尽管比较利益本身往往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作为权宜之计,接受已有的甚至短期内于己有害的非中性国际规则,有时恰恰是自身长期利益之所在。在这里,国际规则可被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

国家主权的日渐相对化,也与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有关。跨国界的污染便是外部性问题的典型例子。在此,污染的成本被当事国分摊,但污染制造国所得收益却并未与被污染国共享。换个角度看,一国为防治污染而进行的巨额投资,在使本国居民受益的同时往往也会让邻国居民坐享其成。结果,扭曲的刺激随之产生了普遍的“免费乘车者问题”(Free-rider problem)^②。非法移民问题与污染问题类似,其实质在于一国的成本与收益和全球的成本与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主权”条目写道:“对内主权的性质决定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对外主权则不同,由于世界有许多主权国家,各主权国家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而且不能在本国之外的更广泛的地区要求行使对内主权,因此对外主权只能是这种情况下互相妥协的结果。”详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 9 卷,第 787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

^② 在经济学中指某些人认为他们可以在不付钱从而不承担成本的条件上享用某种东西时出现的一类问题,免费乘车者问题会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中出现。